

反送中運動在臺灣：抗爭性集會的分析*

何 明 修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摘要

本研究以抗爭性集會 (contentious gatherings) 為中心，考察發生在臺灣的反送中運動。本文發現，反送中的訴求在臺灣獲得廣泛支持，很少有一件境外的議題可以引發如此密集的動員風潮。這場運動是由不同公民社會行動者所推動，呈現空間廣泛分布的特性。大部分的行動是由臺灣人所發起，由於其身分限制，香港人通常需要臺灣人的協助。學生與公民團體是推動臺灣反送中運動的主力，民進黨與獨派小黨也扮演了一定程度的角色。與香港的情況明顯不同，無組織的匿名行動是不常見的現象。儘管這些參與群體出發點不同，政黨、學生、公民團體、教會、律師的共同參與，等於是 2014 年太陽花運動聯盟的重新浮現。在最後，本文就提出若干臺灣反送中運動的特徵，包括廣泛而自發的參與、獨派團體的積極投入、香港人將臺灣視為運動主場的延續，而不是所謂的「國際線」。

關鍵詞：反送中運動、臺灣、香港、抗爭事件

* * *

註 * 本研究使用國立臺灣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核心研究群計畫之資源 (NTUCC-110L891901)。本文初稿曾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所舉辦的《回歸後中港關係的變遷工作坊》(2020 年 6 月 12-13 日)，作者感謝寇健文、蔡永順的評論，以及黃俊豪、曾郁晨、Sylvania 的研究協助。

在 2019 年中爆發的香港反送中運動（或反修例運動），起因是抗議政府所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該草案將合法化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嫌犯引渡。反對者批評，這項修法將會瓦解一國兩制的司法防火牆，讓香港人直接面對共產黨控制的司法系統。大規模的反對運動從 6 月初登場，香港政府採取了強烈的鎮壓手段，在整個夏天，反送中運動越演越烈，從和平遊行延伸至街頭的各種勇武抗爭。到了 9 月初政府終於宣布撤回草案，然而反對運動已經演化成爲全面性的民主運動，堅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在 11 月 24 日的區議員選舉，民主派一舉拿下了 452 席次的 388 席，徹底翻轉了過往由親北京建制派掌控區議會的格局。在同月 27 日，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也正式生效。

儘管反送中運動獲得這些成果，香港抗爭者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截至 2020 年 6 月底爲止，已經有 9,216 人被捕，其中 1,972 人面臨司法的程序，653 人以「暴動罪」被起訴（端傳媒 2020）。此外，也有多位參與者承受了永久性的身體殘害，超過十起以上的自殺或是疑似警察暴力導致的死亡，以及好幾百名抗爭者流亡海外。在區議員選舉後，大規模的抗爭行動明顯減少；在 2020 年初，中聯辦與港澳辦主任被撤換，顯示強硬政策成爲中國政府的主要基調。在武漢肺炎爆發之後，香港政府乘機大肆拘捕反對派領袖、以防疫之名禁止公共集會（限聚令）、以警力排除反對派議員，強行主導立法會議程。中聯辦也自行解釋基本法第 22 條，宣稱有合法權力干預特別行政區之事務。《經濟學人》以「奪取權力的大流行」（a pandemic of power grabs）之標題，強調香港政府與世界各地的獨裁政府一樣，他們乘亂鎮壓異己，穩固自己的權勢（The Economist 2020）。儘管如此，香港抗爭者無懼於肺炎威脅與政權打壓，仍持續發動各種有創意的行動，反送中運動所點燃的怒火仍未完全止息。

就其被捕人數而言，反送中運動已經超過了主權移交前的六七暴動；而就延續的日數而言，也超過了 2014 年的雨傘運動。有鑑於這場運動的重要性，已經有許多學術研究作品出版。反送中運動高度依賴通訊科技，呈現出自我動員與無領導者的特徵（Lee, Yuen, Tang, and Cheng 2019），充分運用了「智慧群眾」（smart mob）的抗爭策略（Ting 2020）。相對於過往香港社會運動的溫和派與勇武派之分歧，反送中運動呈現出罕見的「和勇不分」之高度團結（Lee 2019; Lee, Tang, Yuen, and Cheng 2020）。研究者也提到，反送中運動呈現出高度反中國的心態（Lui 2020; Chan, Nachman, and Mok 2020），企圖打造成一套立基於本土的認同（Mathews 2020），也將其戰線擴展至反對親中的大財團（Chan and Pun 2020）。

也由於反送中運動採取了遍地開花的「落區」^①策略，大部分香港人都直接感受到其抗爭與鎮壓的後果，成為其日常經驗的一部分（Choi 2020），甚至帶來學齡兒童的恐懼與不安（Cheng 2020）。透過反思與學習，香港抗爭者從先前的雨傘運動汲取教訓，採取了更有創意與大膽的抗爭手法（Ho 2020a; Ku 2020）。在抗爭者進化的同時，香港警察汲取過往的教訓，其抗爭處理的手法也日益強硬，更積極動用武力（Wang, Joosse, and Cho 2020; Ho 2020）。

由於地理位置接近，每日往返班機密集，旅居與求學的港人眾多，臺灣是香港此次運動中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國際線」。許多前線抗爭所需的口罩、頭盔、防毒面具與濾罐等物資是在臺灣購買與募集，再運送到香港。為了逃避香港警方的拘捕，臺灣也往往是手足避難的第一站。換言之，臺灣是香港反送中運動最重要的海外後勤基地。

近幾年來，在共同的中國因素作用下，臺灣與香港公民社會出現了密切合作與相互聲援的現象，在 2014 年爆發的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即是明顯例子（吳介民、蔡宏政、鄭祖邦 2017）。儘管北京的期待是「臺灣的香港化」，但是從晚近以來香港關於本土、自決、獨立之政治論述的盛行可見，實際發展的情況卻是「香港的臺灣化」。無庸置疑，香港政治開始出現了「臺灣因素」，然而可以進一步追問的是，臺灣政治是否也出現了「香港因素」？

臺灣的總統與立法院大選在 2020 年 1 月 11 日揭曉，結果蔡英文總統以 817 萬之歷史性高票（57.1%）連任成功，民進黨也維持了立法院多數席次（113 席次之 61 席）。到底香港反送中運動是否牽動了臺灣的選舉結果？落敗的國民黨之檢討報告提到，「香港『反送中』抗爭持續延燒，使民進黨操作『亡國感』策略奏效」（聯合新聞網 2020）。根據中研院社會所在選前一個月的調查研究，在表達投票意願的民眾之中，有 68% 的受訪者表示「很支持」或「支持」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其比例高於蔡英文的實際得票率。即使是在韓國瑜的支持者中，對反送中運動表達支持的比例也是占多數（林宗弘、陳志柔 2020）。^②是否「亡國感」促成了高投票率，以及民進黨的勝選？民調與國民黨的報告都無法確切證實。但是可以確信的，許多人相信香港人抗爭對於臺灣政治發展存在外溢效果，因此，探討香港反送中運動與臺灣的關連性有其必要性。

註① 香港用語，意指抗爭行動不再侷限於特定區域，而是擴散至香港各個區域，並與在地街坊住戶形成連結。

註② 2020 年 6 月，中研院社會所的民調顯示有 67% 的臺灣受訪者支持反送中運動（風傳媒 2020）。

這一篇文章探討發生在臺灣的反送中運動，關切其採取的策略及參與其中的臺灣人與香港人。筆者將以抗爭性集會（contentious gathering）為考察的核心，分析行動者之背景及其採取的抗爭劇碼（protest repertoire）。研究資料主要來自於新聞報導和深度訪談。研究發現，發生於臺灣的反送中運動主要是出於民間對香港人處境之同情，而不是政治人物的介入。旅臺港人是運動的重要成員，但是主力仍是來自於認同反送中運動的臺灣學生、公民團體、律師、教會等。也由於參與者構成的多樣性，臺灣的反送中運動具有紮實與廣泛的社會基礎，進而間接影響了大選的結果。

壹、問題意識：「境外勢力」與「國際線」？

臺灣在香港反送中運動扮演了何種角色？要如何理解與定位發生在臺灣的一系列遊行、集會與各種聲援的行動？一般而言，社會運動是一種由下而上的集體行動，通常採取體制外的策略，推動或是抗拒某一種社會變遷趨勢。大部分的研究作品關注發生於國境或政治邊界之內的社會運動，尤其是抗議者與執政者之間的互動。這樣的研究關切反應出，國家建造（state-building）與社會運動是同時浮現的現代性產物。隨著政治權力的集中化，中央政府成為領土內擁有最多資源的行動者，人民的抗爭對象也開始轉向中央政府，並且訴諸於某種普遍性的意識型態，Tilly 將這種發展趨勢稱之為抗爭的「全國化」（n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s）（Tilly 1997）。儘管如此，社會運動的理念啟發、參與者招募、資源匯集、抗爭手段學習等往往跨越邊境，而且越到全球化的階段，這樣的傳播越頻繁與迅速（della Porta 1999; Flesher Fominaya 2014）。至今，學界已經累積相當多的研究作品，以不同的分析視角探討跨境的社會運動。其中主要的關切議題包括：一、不同地區的社會運動如何因應某些共同面臨的跨境議題，例如跨境污染、血汗工廠、人口販運等；二、社會運動的跨國傳播與學習，例如全球的占領運動與氣候行動等；三、特定社會運動如何在國內與國際的層級，共同採取相應策略。然而，這些既有文獻所提出來的概念，例如跨國傳播（transnational diffusion）、跨國動員網絡（transnational movement activism）等，顯得過於空泛，不容易提供我們思考臺灣與香港反送中運動之具體指引。因此，與其從學術研究的脈絡出發，這一篇論文試圖從既有的公共輿論，尋找合適的對話對象。筆者在此處理「境外勢力說」與「香港人的國際線」兩種看法。

首先，「境外勢力說」是指臺灣政府各種管道或措施支援香港的抗爭者。在以往，北京對於香港民主運動抱持不信任的態度，認定其是西方勢力所扶持的「反中亂港」勢力。在 2014 年的雨傘運動中，中國政府即是以這種態度來面對香港人爭取真普選的要求。儘管美國總統歐巴馬曾親口向習近平保證沒有介入香港，但是這樣的表態顯然沒有改變中國領導人根深柢固的偏見（Ho 2019b, 205）。值得注意的是，過往臺灣鮮少被列為所謂的「境外勢力」，但是在這次反送中運動，臺灣政府曾多次被點名。在 7 月 31 日，前特首董建華指出，「外國勢力煽動港人恐共情緒，破壞內地跟香港的關係」。他進一步宣稱，「種種跡象可以看到，可以指向臺灣及美國」（聯合新聞網 2019c）。在 8 月 19 日，中國國臺辦也要求臺灣政府，「停止插手香港事務，不得以任何方式縱容違法犯罪分子」（聯合新聞網 2019a）。在 8 月底，具有民進黨籍的李孟居在深圳被捕，根據中國官媒的報導，其罪名包括了參與香港的「反中亂港」活動（聯合新聞網 2019b）。

作為一種陰謀論的指控，「境外勢力說」假定看起來是民間自發的活動，無論是發生在香港或是臺灣，背後都有政治人物或是政府的操弄與介入。臺灣政府很早就針對逃犯條例草案表態反對，主要是基於兩個理由。首先，逃犯條例名義上是為解決陳同佳殺人案的引渡問題，但是由於草案將臺灣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因此臺灣政府表明即使草案獲通過，也不提出司法互助的要求。其次，該草案也涵蓋了在香港過境或是居住的臺灣人。從 6 月香港大遊行起，蔡英文就多次在臉書貼文，表明支持香港人追求自由與人權。在 6 月 13 日，總統府祕書長陳菊接見了前來請願的香港學生代表，可算是高規格的重視（中央通訊社 2019c）。隨後，立法院也通過朝野共同聲明，譴責香港政府鎮壓群眾，要求撤回草案（中央通訊社 2019a）。

這些官方的宣示舉動是否有助於發生在香港的實際運動？筆者認為，其作用可能是象徵性的鼓勵，其中最大的助益可能在於臺灣政府不願意承認逃犯條例，從而使香港政府強推草案的正當性受到質疑。至於臺灣政府是否有暗中提供更實際的運動資源與協助，作者認為其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本文接下來會提到，無論是對於臺灣政府有所期待的香港人，抑或是協助香港人運動的臺灣人，都普遍認為臺灣政府所提供的協助是不足夠。

第二種的觀點來自於香港抗爭者所謂的「國際線」，亦即是海外香港人的各種聲援、宣傳與遊說行動。在雨傘運動期間，主事者特意拒絕國際媒體流傳的「雨傘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稱號，以避免引發中國政府對於「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s）的敏感聯想（Ho 2019b, 133）。然而，這樣的自我節制並沒

有獲得北京的善意回應。因此，此次反送中運動中，香港參與者打破這樣的顧忌，積極將其議題國際化，爭取更多的支持。三場規模較大的全球撐香港活動，分別在 6 月 16 日、8 月 17-18 日、9 月 29 日舉行，臺灣也出現同步的集會與遊行。在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後，黃之鋒（2019）曾提到，「海外的香港人就是為我們守好國際戰線，在國際包圍中共」。

如前文所述，臺灣是香港反送中運動最重要的海外後勤基地。除卻集會聲援、物資輸送、手足避難，香港人在臺灣還有許多其他形式的連結。例如，香港的出版自由日益惡化，許多與反送中運動相關的書籍與攝影集便選擇在臺灣出版，之後再銷往香港。而在暑假期間，也有許多香港留學生回鄉參與進展中的運動抗爭。事實上，筆者也訪談過每週末搭機回港參與運動的香港旅臺僑民。一位受訪的香港人就指出：

「臺灣是香港通往其他海外的橋樑，香港人會覺得臺灣是最近的海外戰線，也是最重要的。其他海外香港人也看臺灣的動員狀況作為一個指標……在倫敦、美國紐約、波士頓、加州可能只有幾十人，或是幾百人，最多就是上千人，但是在臺灣卻有可能發起上萬人的活動。臺灣的動員成功，就算是國際線的成功」。^③

事實上，「國際線」的說法符合社會運動研究所謂的「迴力標效應」（boomerang effect）。這個概念是指運動者尋找國境以外的盟友，無論其對象是國際組織、外國政府或其他運動組織（Keck and Sikkink 1998），其目的在於將壓力移轉回到境內的執政者。反送中運動積極運作其國際戰線，包括多次刊登外國報紙廣告、遊說外國政府、發動全球聲援活動等，都可以算是迴力標效應的使用，其目的在於向北京與香港政府製造更大的壓力。在臺灣，從 2019 年 6 月初以來，就有許多香港網民在蔡英文總統臉書留言，請求支持反送中，後來陸續也有香港運動者來臺灣，呼籲強化香港抗爭者來臺的庇護機制。

然而，如果只是將發生在臺灣各種行動視為反送中運動的國際線，純粹由海外香港人所發起的，這將忽略了臺灣本地社會行動者所扮演的各種角色，而後者亦將其特定意圖帶入了反送中運動。臺灣的反送中運動不能簡化為 Benedict Anderson 所謂的「遠距民族主義」（long-distance nationalism）（Anderson 1998, 58-74）。

註③ 作者訪談，香港邊城青年幹部，臺灣，2020 年 5 月 4 日。

總結來說，「境外勢力」與「國際線」都是失真或過度簡化的說法，因此，重點在於掌握臺灣反送中運動的發起者身分與其團體屬性。接下來我們將以抗爭性集會為考察中心，以釐清這場運動之動態與全貌。

貳、抗爭性集會：研究方法

根據 Tilly (1981, 76) 的定義，「抗爭性集會」(contentious gathering) 指一種多人聚集的場合，他們採取各種行動，並且提出與某些團體利益衝突的共同要求。這個古典定義呈現了社會運動的傳統策略，無論是定點的聚集或是流動性的遊行，反對者總是號召支持群眾的參加，向對手施壓。社會運動的力量即是在於所展現出來共同的價值(worthiness)、一致(unity)、數目(number)與信念(commitment) (Tilly 2004, 4)。社會運動不能化約為抗爭性集會的總合，因為運動者還得幕後籌措資源、建立組織、與執政者談判等。再且，以抗爭性集會為核心的考察，自然有其限制，包括了：

一、重視集體性抗爭，而不是個體的行動：一般而言，社會運動者相信數量的邏輯(the logic of number)，越多人走上街頭，就能越代表真實的民意。不過，這樣預設容易忽略個體的不服從，以及其對於既有體制的衝擊。Rosa Parks 在 1955 年拒絕在公車上讓位，拒絕移到專屬黑人的次等座位，從而引發以靜坐(sit-in)風潮為動力的美國民權運動，正是著名的例子。體制內人士糾舉不法、甚至現身控訴的吹哨行動(whistle blowing)，也可能帶來比一場大規模的示威行動更具有破壞性的結果。同樣的道理也解釋了名人支持與背書所帶來的運動效應。另外，晚近以來引發全球風潮的 Me Too 運動也不是傳統意義下的社會運動，因為其力量是來自於個別的性騷擾或性暴力受害者的出面指控。

二、重視實際空間的聚會，而不是網路空間與雲端。有些研究者主張，資訊通訊科技的突破已經帶來社會運動典範轉移。Castells (2012) 指出，過往的社會運動依賴大眾媒體，但是現今的網路帶來「大眾自我傳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隨著抗爭者與報導者的界限模糊化，立即性的抗爭社群(instant insurgent communities) 更容易浮現，也不再依賴既有運動組織。Bennett 和 Segerbert (2013) 主張，傳統社會運動依賴群眾動員的集體行動邏輯(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而網路社會運動則是一種去中心化與迅速的連結邏輯(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在臺灣的反送中運動中，個體性的行動包括在校園懸掛抗議布條、藝術創作（裝置藝術、歌曲、樂高積木等）、商店張貼反抗議海報等、在正式儀式（畢業典禮、頒獎典禮）表達立場、持「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登玉山等。許多上述的個體行動也是透過社群媒體來傳播，因此成為網路事件。許多政治人物、政府單位、名人等也透過臉書表達對於反送中運動的支持。

三、排除室內與靜態的活動。臺灣的反送中運動者曾舉行記者會、座談會、講座、布置連儂牆等活動，這些事件因為其衝突性低，通常不會被視為抗爭性集會。

但是儘管有上述限制，請願、遊行、絕食抗議、靜坐、暴力攻擊等具體呈現的公共行動仍是最典型的（modular）社會運動之展現手法。與其他指標相比，例如連署人數、網站點擊人數等，抗爭性集會的規模與頻繁更直接反映社會運動之發展趨勢。

在操作上，本文以《自由時報》與臺灣《蘋果日報》的新聞資料庫為觀察範圍，蒐集自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1 月為止的臺灣反送中運動的相關報導。凡是符合抗爭性集會定義之報導，本研究登錄日期、活類動型、發起團體、地點、人數等資訊。若干有明確主辦團體之活動，也一併參考其臉書活動頁面。根據上述的操作方式，本文一共找到了 95 件抗爭性集會。

表 1 臺灣的反送中抗爭性集會（按活動類型）

活動類型	案件數
集會（總計）	84
集會（快閃）	6
集會（禮拜）	5
集會（人鏈）	5
集會（追悼）	3
遊行	6
演唱會	4
電影放映會	1
總計	95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上表呈現了 95 件抗爭集會的活動類型分布，定點舉行的集會有 84 件，顯然占了絕大多數。集會樣態有多種，其中 6 件快閃性的集會通常是網路號召，迅速解

散，所需要的事先準備最少。5 件以禱告或禮拜為名的集會是由教會發起。另外，5 件人鏈式集會與 3 件追悼會則明顯是借用香港人的抗爭手法。相對地，遊行活動需要事先申請與較完整的規劃，因此數量較少，6 件遊行分別發生在臺北、臺中、臺南。

此外，本研究也透過深度訪談蒐集資料。從 2019 年 10 月到 2020 年 9 月為止，筆者與研究助理共訪談了 31 位有參與臺灣反送中運動的相關人士，其中包括 17 位臺灣人、12 位香港人（其中包括已經取得臺灣國籍者、取得西方國家政治庇護或永久居留權者）、2 位澳門人（其中包括具有香港身分證者）。這些受訪者的身分包括學生、公民團體幹部、律師、牧師、學者、密集參與運動的上班族或家庭主婦等。他們的主要活動範圍包括臺北、新竹、雲林、臺南、高雄、屏東等。這些受訪者的選擇是採取滾雪球方式的抽樣，透過人際網絡而獲得深度訪談的機會。訪談問卷是以人而量身設計，儘管本研究關注抗爭性集會，但是許多受訪者仍參與了網路動員、連儂牆等類型的行動。

參、廣泛的但是非同步的在地支持

6 月 9 日，香港出現了第一場大規模的反送中遊行，主辦單位估計有 103 萬人走上街頭。在同一天，臺灣就有兩場活動分別舉行。一是香港留學生透過網路號召，在臺北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抗議，並且遞交連署聲明，臺灣學生與政治人物也有參與；另一場則是由長老教會所舉行的「聖靈降臨節反送中」，由牧師帶領信徒進行禮拜及祈禱，分別在臺北、臺中、臺南進行。^④隨著香港反送中運動加劇，612 包圍立法會、616 兩百萬人大遊行的爆發，臺灣的抗爭性集會更加密集發生，許多大學校園出現了「我在 XX（大學）反送中」之集會。其中，最盛大的是 6 月 16 日在立法院外舉行的集會。這場活動是由在臺香港學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後來改組為香港邊城青年）、臺灣公民陣線、臺灣青年民主協會所共同舉行，宣稱吸引了近萬人參與。然而在密集動員的六月之後，臺灣的活動卻迅速萎縮，整個七月份只有發生一件。到了八月，抗爭性集會才又逐漸回升，其中還包括「臺港同心 817 全球抗爭連線」，是同步在臺北、新北、臺中、高雄所舉行的集會、快閃與戶外電影放映會。

註④ 作者訪談，臺灣長老教會 JN 教會主任牧師，2020 年 4 月 10 日。

9 月初臺灣開學之後，大學生與高中生回到校園，各校園也紛紛出現了支持香港人的連儂牆與其他行動。9 月 29 日是運動的另一個高潮，臺北舉行了一場「撐港反極權」大遊行，媒體報導有十萬人冒著大雨參與了這場盛大的活動。根據主辦單位在遊行起點的估算，至少有七萬人參與。^⑤在同一天，高雄與臺南也有相同主題的集會與遊行。在 10 月 1 日，北部五間大學（淡江、文化、政治、北藝大、臺北大）同時發起了人鏈集會活動。

接下來能夠吸引大量民衆參與的活動則是在三場分別在臺北（11 月 22 日）、臺南（11 月 17 日）、臺中（11 月 30 日）所舉行的大型演唱會，主題分別是「撐香港，要自由」與「香港：自由」。最後，在臺灣大選前一天 1 月 10 日，也有大批的香港人穿黑衣、手持反送中標語或是旗幟，參與蔡英文的掃街與凱達格蘭大道造勢大會。

在七個月的期間內，臺灣發生了 95 場的反送中抗爭性集會。考慮到其關注的議題是發生在境外，就其密集程度而言，的確是相當罕見。在過往，臺灣的抗爭行動主要是針對國內爭議，鮮少會有人願意因為某些不直接相關的國際議題而走上街頭。舉例而言，臺灣青少年在 2019 年發起一連串針對氣候變遷的「爲了未來的週五」（Fridays for Future）之行動，但是參與人數相當有限，也無法喚起媒體與公衆的注意。在過去三十年，臺灣也曾出現聲援境外議題的社會行動，包括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2008 年的圖博抗暴、2009 年要求緬甸釋放翁山蘇姬、2014 年的雨傘運動、2017 年要求釋放劉曉波、2020 年聲援泰國學生運動等，但是從來沒有出現這樣規模與頻率的風潮。因此，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確喚起了臺灣人深刻的共鳴。

香港人對於這些臺灣活動的規模感到意外，一位參與其中的學生提到：

「612（按：臺北香港經貿文協的抗議）那天一開始放晴，後來下雨。有些同學是一大早七點多就到了，也有很多記者來採訪，我有看到幾位同校同學的香港學長也來參與。他們有請臺灣的公民團體演講，我覺得很感動，因爲臺灣有人關心我們」。^⑥

另一位受訪者也指出，

註⑤ 作者訪談，臺灣公民陣線研究員，2019 年 10 月 22 日。

註⑥ 作者訪談，臺北 TW 大學學生，2019 年 5 月 12 日。

「在立法院前的集會（按：6月16日），那次很多人來，看到很多香港人，覺得很感動。本來覺得只會有幾百人來，但是現場就是有上千人。那是第一次因為香港議題而有這麼多人的集會，參與的大部分是學生，以及沒有經驗的素人。本來以為是在海外，所以人不會太多，但是結果比我預期多很多人」。^⑦

臺灣人也對於廣泛的支持與同情感到意外，一位臺灣學生運動幹部指出，

「929（按：撐港反極權大遊行）人數超出期待，原本預期是616（按：立法院前的集會）的最多兩倍，希望有五萬……結果最後喊了十萬。我們W校同學有組團去，在連儂牆貼929臺港大遊行、開群組的同學，相約去遊行。那天很多我的學校朋友有出現。有些過去不太參與高度政治性議題的人也有去，但他們的理解有點像同性婚姻，他不會認為反送中是政治性議題，反而像人權議題」。^⑧

同婚爭議在臺灣向來是與年齡密切相關，一項2016年調查指出，30歲以下的受訪者支持同婚比例為八成（Ho 2019a, 495）。換言之，如果臺灣的大學生是以支持同婚態度來看待反送中，那反送中等於是獲得了相當廣泛的支持。同樣地，臺灣的基督宗教在過去曾因為同婚議題產生分裂，保守派因此積極參與政治，試圖阻擋婚姻平權。但是反送中議題上，卻呈現難能可見的團結。黨國色彩濃厚的國語新教教會也發起為香港的民主自由禱告，即使是反同的臺語教會，也積極參與各種反送中的抗爭性集會。臺灣的天主教會與香港有密集交流，內部也有許多同情反送中運動的聲音。^⑨

註⑦ 作者訪談，香港邊城青年幹部，臺灣，2020年5月4日。

註⑧ 作者訪談，臺北前SC大學學生會議長，2020年3月6日。

註⑨ 筆者曾在2019年11月2日參與一場由臺北天主教會組織所發起的座談會，其主題雖然是針對臺灣的年輕選民，會場討論的焦點仍是放在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表 2 臺灣的反送中抗爭性集會（按月份）

月份	案件數
6 月	37
7 月	1
8 月	11
9 月	15
10 月	15
11 月	8
12 月	6
1 月	2
總計	95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上表顯示，6 月份是臺灣反送中運動的高潮，總共發生了 37 件抗爭性集會，在經歷了 7 月份的低迷之後，8、9、10 月三個月份都有 10 件以上。但是從 11 月之後，反送中運動的案件明顯降少。臺灣的發展趨勢是與香港不同步，並沒有持續升溫。在香港，6 月份雖然有兩場超過百萬人的大遊行與包圍立法會事件，但是抗爭大致上仍是相對和平，也只侷限於港島區。到了 7 月之後，抗爭風潮擴散到九龍與新界，之後大型示威活動幾乎每週上演，最慘烈的衝突是在 11 月底的理工大學包圍，總共長達 13 天，有超過 1300 人被捕。在漫長的「香港之夏」，驅動抗爭動力的是一連串的警察暴力，其中包括了 721 元朗白衣人事件、811 尖沙咀少女爆眼、831 太古站無差別攻擊、1001 荃灣學生中彈、1011 陳彥霖浮屍、1108 周梓樂死亡、1111 西灣河學生中彈等。很明顯，臺灣民衆缺乏親身經驗，除非是關注議題發展的少數人士，一般人並不容易經歷所謂的道德震撼（moral shock）。

下表呈現了 95 件抗爭性集會的空間分布：

表 3 臺灣的反送中抗爭性集會（按地點）

縣市	案件數
臺北市	45
臺南市	11
臺中市	10
高雄市	7
新竹市	4
新北市	4
嘉義市	3
桃園市	2
嘉義縣	2
彰化縣	2
新竹縣	1
花蓮縣	1
雲林縣	1
苗栗縣	1
屏東縣	1
總計	95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從上表來看，臺灣反送中運動在空間上平均分布。臺北市是全國政治中心，有具體的抗議與請願之標的（香港經貿文辦、總統府、立法院），也是大型活動（616 集會、929 遊行、1122 演唱會）的舉行地點，但是整體來看，只產生了 45 場抗爭性集會，沒有超過總案件數的一半。包括臺北市在內的六個直轄市（即六都）是臺灣都市化較高的地區，也是香港移民的置屋首選，但是仍有 16 件案件發生在六都以外的縣市，甚至遍及了東部與被認為較缺乏發展的花蓮、雲林、苗栗與屏東。反送中運動在臺灣獲得廣大的回響，也可以從下列臺南公民團體的訪談得到印證：

「929（按：『抗極權，我在臺南撐香港』）遊行算是成功，臺南能出到上千人就是不簡單。臺南已經有六屆的彩虹遊行，也只有這兩年才有上

千人。2013 年在臺南辦廢核遊行都不到千人。自由時報所講的兩千人，是我們自己喊的，但是肯定有上千人」。^⑩

儘管享有廣泛的同情，臺灣反送中運動者仍是承受各種的阻力與打壓。舉例而言，各縣市對於張貼於公共場所的連儂牆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如果在地首長是國民黨籍，各種需要事先申請的活動通常不會獲得允許。就以國民黨執政的雲林縣為例，

「公民團體本來是在市區的雲中街舊警察宿舍辦活動，後來他們都拒絕我們了。連斗六夜市都不能用了，用一堆藉口不讓我們辦活動。高中生的移動連儂牆只辦一次，後來就沒有了……我們向斗六夜市申請要辦連儂牆，但是他們負責人是藍的，所以不同意。所以整個雲林縣只有一個連儂牆，就是在民進黨立委劉建國辦公室旁邊，內容不是很漂亮」。^⑪

柯文哲主政的臺北市亦是如此。原先在西門町連儂牆被市政府清除，在公館地下道連儂牆也是如此，後來只得透過市議員的申請，才取得一定期限內的張貼許可。^⑫在韓國瑜主政的高雄市，香港人在火車站前的募集物資活動，也被警察阻止，甚至帶去派出所問話。^⑬

此外，在各種抗爭性集會中，從事者也受到臺灣急統派（愛國同心會、統促黨等）之攻擊與恐嚇，或與韓國瑜支持者（韓粉）產生口角。包括義守、文化、世新、東吳、中山、成功等大學的校園連儂牆也受到中國籍學生與觀光客之破壞。事後許多私立學校因為不敢得罪中生，企圖大事化小，避免破壞情事的曝光與後續司法處理。有些學校甚至阻止新聞媒體的報導，以免家醜外揚。理所當然，親中的政治人物與私立學校主管之作爲，進一步激起了支持反送中的臺灣人與香港人之憤怒與彼此團結。

註⑩ 作者訪談，臺南新芽幹部，2020 年 4 月 29 日。

註⑪ 作者訪談，雲林縣山線社區大學幹部，2019 年 11 月 26 日。

註⑫ 作者訪談，香港邊城青年幹部，臺灣，2020 年 4 月 17 日。

註⑬ 作者訪談，高雄 YS 大學研究所學生，2020 年 2 月 17 日。

肆、運動中的臺灣人與香港人

哪些群體或團體發起這 95 件抗爭性集會，也是一個重要的分析線索。就主辦團體的身分而言，純粹臺灣人舉行的活動有 49 件，純粹香港人主辦的活動有 19 件，兩者合辦的活動則有 26 件，另外有 1 件無法確認。換言之，發生在臺灣的反送中運動其實還是由臺灣人所主導，因此不能化約為香港抗爭者的「國際線」或是「遠距民族主義」。

在實務上，香港人在臺灣其實面臨了重重的集體行動阻礙。首先，在臺灣的香港移民缺乏彼此的組織聯繫，而是各自採取了個人主義的因應策略。老一輩的移民有成立同鄉會，但是他們通常吸引不到年輕人的參加。更不利的是，年長的香港移民通常持比較保守的政治態度，對於反送中運動採取反對甚至是敵視的態度。^⑭在近幾年來，香港人移居臺灣有出現明顯的成長。儘管這些年輕一輩的移民通常比較同情反送中運動，無論其移民理由是基於婚姻、工作或是其他，然而，他們沒有成立移民互助團體，平時至多也只是透過社群媒體交換生活訊息。^⑮這樣的雲端弱連帶（weak ties）缺乏互信基礎，也無法深入談論政治議題，更遑論成為運動動員的基礎結構。

按理來講，臺灣各大學的港澳同學會應該成為重要的運動動員組織，然而在現實上，校園的港澳同學會通常無法以組織的名義參與，也不能發揮招募成員的作用。香港學生與澳門學生在臺灣的入學制度下是被綑綁在一起，但是兩個城市的生活習慣其實差異很大，即使粵語可以作為相互溝通媒介，但兩群學生的界限相當明顯。再且，或許是因為人數劣勢，澳門人更願意參加港澳同學會，成為其幹部，而他們有更多的身分顧忌與較為保守的政治態度，也使得港澳同學會無法成為臺灣反送中運動的主力。

由於香港反送中運動受到強力鎮壓，其中傳出不少起關於警方臥底而導致抗爭者被捕的事件，這種對於告密者（即香港人所謂的「鬼」）的不信任，已經成為在臺香港人的日常因應與保全之道。有些香港人運動組織之間溝通是採用假名，或是使用加密而安全的訊息軟體。香港人主導的關注組不願意招攬更多的成員，而寧願維持既有小規模運作，因為他們不能確定其他香港人的真實意圖。如此一來，志同

註⑭ 作者訪談，香港邊城青年幹部，臺灣，2020 年 4 月 17 日。

註⑮ 作者訪談，臺南香港關注組成員，2020 年 5 月 6 日。

道合的香港人反而是要透過反送中運動才能串連起來，這也解釋了為何臺灣各地的連儂牆成爲了這些香港移民彼此認識的重要媒介，許多香港學生也是在各種抗爭性集會才建立關係。舉例而言，一位參與公館連儂牆的受訪者指出：

「有很多善心人送飲料到我們在公館的連儂牆。他們會自稱家長，覺得是自己老一輩沒有做好，才讓這一輩落入困境。有些人會給我們建議，像是怎麼去聯繫大家，有些以前做過傳播工作的，會幫我看一下發言稿或是教我們如何與記者應對。這個香港移民社群的力量很團結嗎？我覺得有點像是風潮，相對於臺灣人，香港人的性格比較缺乏人情味，我們本身其實是滿不團結的，但反送中這件事讓我們團結起來」。¹⁶

其次，香港人對於臺灣的法律不熟悉，尤其是關於集會遊行與成立組織之申請。也由於其身分緣故，他們不能成爲正式立案團體的發起人。因此，香港人的組織必得依賴臺灣人或是臺灣人的組織才能從事若干法律所允許的活動，例如開設捐款帳戶等。無論是移民或是學生，香港人的行動都是依賴臺灣的支持者，其中有一些有香港留學背景、並且通曉粵語的臺灣運動者成爲重要的串連媒介。

若干活動的舉行是需要臺灣人的協助，無法只靠香港人的力量。舉例而言，10月25日，長老教會與香港人在臺北二二八公園設置了「港鐵太子站追悼牆」，並且舉行追悼會紀念反送中運動被自殺、墜樓的罹難者。該場地是歸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所管，活動主辦單位需要繳交租金。因此，教會人士就去找二二八受難家屬，以其名義提出主辦申請，紀念館就不收費用，而且容許其「追悼牆」擺設至2020年2月。

因此在種種可行性的考慮之下，香港人與臺灣人合辦的抗爭性集會（26件）超過其單獨舉辦的案件數（18件）。然而儘管反對逃犯條例與警察暴力是共同的想法，兩群人的合作並不是理所當然，在若干議題上，也呈現出臺港的分歧。舉例而言，

「在一些用語中，臺灣人與香港人的使用脈絡不太一樣。例如香港人會說『一國兩制名存實亡』，因爲回歸之後的他們感受就是如此，但是臺灣還沒有走到那一步。臺灣這邊會說『拒絕一國兩制』，因爲我們還不到那

註¹⁶ 作者訪談，香港邊城青年幹部，臺灣，2020年4月17日。

個地步」。^{①⑦}

如果在一份聲明或新聞稿，如果出現了「反對一國兩制」字眼，就會造成臺灣人與香港人不同的解釋。如果沒有適當的解釋，香港人可能會誤以為，臺灣人贊成在香港實行「一國一制」。同樣的道理，臺灣參與者也是帶有原先預設立場看待香港人。在香港反送中運動，高舉外國國旗，例如美國、英國、或是追求獨立的加泰隆尼亞，是常見的景象，目的在於喚起更多國際的支持。在許多場合，例如雙十節，香港抗爭者也曾高舉中華民國的國旗。然而，積極參與反送中的臺灣人通常是獨派，心態上排斥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再且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的熱情支持者（韓粉）經常身穿國旗裝，這使得那面旗幟的感受在臺灣是呈現高度分歧的。一位在臺的香港組織幹部指出：

「香港人只知道好的中華民國歷史，就是孫文創立民國、提出三民主義，他們不知道蔣介石來臺灣之後的事情。反送中運動者手持中華民國國旗，我們就被支持我們的臺灣人罵。我們後來就告訴香港人，你想要取得臺灣人的支持有很多方法，並不是全部的臺灣人都認同那一面旗幟，那樣看來很國民黨。我們好心告訴香港人，但是很多人是根本沒有想過，也有人認為我們就是鬼，故意來搞破壞」。^{①⑧}

此外，臺灣人與香港人的認知落差也反應在活動類型。自從反核團體在 2009 年舉行的「貢寮諾努客音樂會」以來（Wei 2016, 14），以搖滾音樂會的形式，結合獨立音樂表演與演講，已經成為臺灣社會運動常見的形態，日後也擴展至其他的議題，包括「二二八共生音樂節」、反迫遷、六四紀念等。音樂與抗議的結合會使活動較為輕鬆活潑，也較能吸引年輕人的參與。然而，香港人並不一定能夠習慣這樣活動形態。在 2014 年雨傘運動期間，臺灣的團體就曾在臺北自由廣場舉行聲援晚會，找了支持的音樂人來表演。然而，主事者事後提到：

「警察是估計現場是七、八千人，其實過半是香港人。我們當初是想要讓臺灣人關心香港議題，所以搞得像是演唱會，找了臺語歌手來唱歌。

註①⑦ 作者訪談，臺灣公民陣線召集人，2020 年 3 月 20 日。

註①⑧ 作者訪談，香港邊城青年幹部，臺灣，2020 年 5 月 4 日。

香港朋友是跑來抗議，他們覺得這是爲了臺灣人辦的，不是爲香港」。^{①⑨}

在臺灣的反送中運動中，一共出現了 4 場演唱會，都是由臺灣人團體所舉辦。一位參與其中的澳門學生就指出，

「在 11 月演唱會（按：11 月 17 日的『撐香港，要自由』），我最大的感覺是那是辦給臺灣人的活動，上臺演唱的大部分是臺灣獨立音樂表演者，只有在串場時，主持人會提到香港的近況，或是喊一些『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口號。在音樂會旁有一些小攤，有些人會去購買一些與運動有關的東西。那天，在中正紀念堂附近的居民，也有一家大小一同參與，有些人可能原先只是來散步，所以一定對有些臺灣人的宣傳效果。但是對我而言，音樂會是沒有引發更大的共鳴，臺上講的主題大部分是與香港沒有關，而且很多表演者唱我聽不懂的臺語歌。我有一點局外人的感覺」。^{②⑩}

臺灣人與香港人所期待的反送中運動樣態存在落差。香港人感受到的是立即而明確的危險，而臺灣人所看到的則是對於自身的啓示，亦即是所謂「今日香港、明日臺灣」。下一節會提到，聲援香港人抗爭的臺灣參與者本來就有其核心關懷議題，而且他們也是透過各自的視角看待反送中，也因此必然與香港人的期待有所不同。總得來說，在臺灣所發生的反送中運動不單純只是香港人的事，也是臺灣人的運動，而且也帶入香港人所沒有的關切，例如反對被併吞等。

此外，臺灣的反送中運動者深知兩地的資訊與體驗之差異，因此許多行動都是爲了讓更多的臺灣人知道實際的香港現況。一位香港參與者提到，她的組織在臉書上都要做「每日香港」的新聞整理，而不是直接轉貼現成的網路報導，

「我們想要做資訊橋，填補臺港之間的漏洞……香港新聞大部分是針對香港人，講得比較快，香港人自己追每天發生的事情也追得很辛苦。但我們對象是臺灣人，臺灣也有自己的議題要關心，所以我們的傳達要更

註①⑨ 作者訪談，華人民主書院董事，臺灣，2020 年 3 月 19 日。

註②⑩ 作者訪談，臺北 TW 大學學生，2020 年 5 月 12 日。

直接、更濃縮」。^①

香港各地浮現的連儂牆比較像是反抗意志的展現，或者是街坊鄰居彼此相互打氣，以維持運動的士氣。相對於此，臺灣的連儂牆則比較像是純粹的資訊站，需要向留步駐足的民衆解釋到底香港發生了什麼事。一位香港學生提到自己的經驗：

「我試著向觀看連儂牆的路人說明，像發生什麼事，什麼重點要知道，有哪些迷思要破除，什麼是假新聞。我主要講來龍去脈。有人會問香港人為什麼要這樣，年輕人的暴力不就是暴力嗎？我個人回答還是要追究來龍去脈，不是我們主動發起，這是壓抑過後的反抗的一種方法。有些人還是不接受，他們覺得和平方式處理或許有不一樣效果」。^②

如何讓臺灣人親身感受到香港人切身的傷痛與憤怒，一直是運動者所試圖努力的目標。就這一點而言，身處臺灣的參與者之處境類似美國六〇年代的反戰運動者，後者採取了「將越南帶回來」（bringing Vietnam home）的策略，讓更多漠不關心的美國人感受到越戰的慘烈。在 11 月 16 日，臺北信義區鬧區更出現了一場「香港縮時：一起喚醒對中共暴行仍無所知的人」之行動藝術，幾十位表演者試圖重現香港人日常所面對的警察暴力（中央通訊社 2019b）。這場結合實驗藝術與社會倡議的活動並不常見，但這也顯示了主事者意識到臺灣人缺乏「實境體驗」，有必要採取這種高度干擾性的介入，以喚起更多人的關注。

註① 作者訪談，香港邊城青年幹部，臺灣，2020 年 2 月 2 日。

註② 作者訪談，臺北 TP 大學學生，2020 年 3 月 4 日。

伍、太陽花聯盟的重新登場：政黨、學生、公民團體、教會與律師

表 4 臺灣的反送中抗爭性集會（按發起團體）

發起團體	案件數
學生單獨主辦	29
學生與其他團體合辦	20
學生小計	49
公民團體單獨主辦	16
公民團體與其他團體合辦	5
公民團體小計	21
政治團體（單獨或合辦）	12
教會（單獨或合辦）	10
無組織	1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上表呈現了 95 件抗爭性集會的發起團體之分布。學生是最積極的參與者，獨辦或合辦的活動超過了總案件之一半（49）。除了臺灣學生聯合會、臺灣青年民主協會之少數例外，學生發起團體都是各學校的學生會、學生議會、社團或關注組，也因此，大部分的活動都是在個別校園進行。學生主導的行動很難在暑假期間進行，在 7、8 月份，總共只有 2 件學生發起的抗爭性集會，這也或多或少解釋了臺灣與香港活動舉行之不同步。

其次，公民團體舉辦了 21 件，政治團體 12 件，教會 10 件。值得注意的是，沒有特定組織發起的活動（亦即是媒體報導中所指出「民衆」、「X 姓號召人」、「在地青年」等）只有 12 件。這與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無大臺」有明顯的差異。在香港，「和你塞」（堵路）、「和你飛」（圍堵機場）、「和你 shop」（賣場的結集抗議）、「和你 lunch」（上班族的午休時間抗議）都是通過社群媒體發起，尤其是具有加密功能的連登與 Telegram，完全沒有辦法查出誰是發起者。在臺灣，這種爲了規避警察拘捕的匿名行動既沒有必要，也不一定能帶來效果。

臺灣人發起反送中運動，固然是出於同情與理念的契合，但是不同團體有其

各自的參與背景脈絡，也帶入相異的動機。接下來，將分別以政黨、學生、公民團體、教會、律師等團體來說明。

一、政黨的選舉考量

香港政府在 2019 年初提出逃犯條例時，時代力量召開記者會批評，擔心赴港旅遊的臺灣人會被「送中」（獨立媒體 2019）。隨著選舉季節的到來，各政黨對於香港議題也更加重視。民進黨與獨派的時代力量、基進黨、臺聯黨、自由臺灣黨發起了共 12 件反送中運動的抗爭性集會。小黨要在激烈的選舉中脫穎而出，通常是掌握對特定議題高度關注的「利基選民」（niche voters）。在 2018 年的公投中，願意對爭議性高的同性婚姻議題表態的候選人通常是來自於小黨，無論其立場是贊成或反對；相對於小黨，民進黨與國民黨兩大黨儘管有意識型態上的差異，但其候選人願意公開表達立場的比例上較少。

一位小黨的輔選人員提到自己擔任候選人臉書專頁小編的感想：

「我發現只要貼香港的訊息，按讚數會很高，所以後來就是在比快，看不同政治陣營手腳比較快。這是不是在消費香港？我自己心中也是很懷疑，有焦慮，但是還是要做。我意識到這一點，就是看民進黨 XX 的粉專，她做這一件事，一點成本都沒有，只是轉貼一則很多人遊行的照片，就有一兩萬人按讚，比平常多很多，很多人都會留言『香港加油』」。^②

事實上，不同競選陣營會在相近地點舉行類似的活動，形成「撞場」的局面。在 6 月 16 日，新竹的時代力量立委參選人與民進黨立委參選人，分別在火車站與護城河廣場舉行活動，兩地距離不到 500 公尺，而且兩場活動所喊的口號與所持的標語極為相似，分別為「我在新竹、我挺香港」和「我在新竹撐香港」（自由時報 2019b）。

執政的民進黨享有更多資源可以打香港牌，民進黨候選人積極宣傳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在 9 月 29 日遊行前夕，民進黨中央黨部製作一份「撐香港反送中」的影片，其中參與發言的香港人包括了林榮基與兩位在臺的香港學生（風傳媒 2019）。

註② 作者訪談，時代力量黨工，臺灣，2020 年 4 月 27 日。

11 月份的三場大型演唱會就是由支持蔡英文連任的守民主護臺灣大聯盟與林佳龍的光合基金會所舉行。在一些公民團體或學生主辦的活動，民進黨政治人物或立委候選人也有機會登臺，他們的講法通常很是簡化，「票要投小英，臺灣不要變香港。投錯票，解放軍就會來，六四就在臺灣上演」。^⑭越到選戰後期，民進黨政治人物更是積極打香港議題，一位高雄市的立委候選人在造勢晚會，「自己準備了投影片，一張一張講香港，也講到他的下一代，他自己有好幾個小孩，也很擔憂臺灣的未來」。^⑮或許，民進黨最成功的操作是在選前 5 天所公布的小英總統競選 CF 《大聲說話》，這支三分鐘的影片旁白從頭到尾沒有提到香港，但是幾乎每一則影像都是指涉半年以來香港流血抗爭的著名畫面。截止 2020 年 10 月 16 日為止，該影片在 YouTube 上已經累積了超過 49 萬觀賞人次（蔡英文 2019）。

無疑地，政黨介入是爲了勝選的考量，但是香港人又是如何看待？在此，香港人的態度與實際作法呈現出不一致的狀態。有些在臺的香港運動者認爲應該保持政黨中立色彩，因爲萬一是國民黨勝選，接下來仍需取得臺灣政府的支持。因此，當民進黨臉書小編轉貼香港人募集物資的訊息，他們覺得很不妥，也透過私下管道，取消了該則貼文。^⑯但是同一組織的香港人，也有人參與民進黨製作的宣傳影片。有些香港人認爲應該積極表態，因爲「守住臺灣就是最好的撐香港」。在 11 月 22 日高雄的「We care 罷韓大遊行」，其中有一隊是「撐香港大隊」，許多人穿黑衣、戴面具、手持「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黑旗參與。一位參與香港學生指出，很多移居南部的香港人都來參與，估計現場約有三千位香港人。^⑰

另一方面，不少香港抗爭者逃亡至臺灣，民進黨政府儘管提供了不少未公開的權宜措施，但是始終不願意承諾香港人要求的庇護機制與難民法。有些香港運動者因此公開指責「民進黨只想用香港人的鮮血換取臺灣人的選票」，即是所謂的「人血饅頭」之指控。不過，由於這樣的發言被國民黨陣營利用，發言者後來再度來到臺灣公開致歉，強調「不可能批評一向支持香港的民進黨」（自由時報 2019a）。這種插曲也顯示，在既有兩大黨的對抗格局下，香港人的選項是高度受限的。

對於臺灣大選，支持反送中的香港人期待民進黨能勝選。但是基於外國人的身分，同時也知道自己的公然表態不見得有利於選情，因此，包括黃之鋒與新當選

註⑭ 作者訪談，屏東大學教授，2019 年 11 月 22 日。

註⑮ 作者訪談，臺北前 SC 大學學生會議長，2020 年 3 月 6 日。

註⑯ 作者訪談，香港邊城青年幹部，臺灣，2020 年 4 月 17 日。

註⑰ 作者訪談，高雄 YS 大學研究所學生，2020 年 2 月 17 日。

的香港區議員，錄製影片所用論述皆是鼓勵臺灣年輕人返鄉投票，在臺的香港人組織也是採取相同論述策略。部分原因在於，從香港 11 月 24 日的區議會選舉經驗來看，只要年輕人投票率高，支持反送中的候選人就容易勝選。或許，這種欲言又止的幽微心態最明顯表達於 1 月 10 日大選之前的最後一天。在臺北的蔡英文白天掃街與晚上造勢大會上，許多前來觀選的香港人高喊「時代革命」的口號、高唱「願榮光歸香港」、揮舞著「光復香港」的黑旗。為何他們不會去國民黨韓國瑜的選前之夜表達相同的訴求？很顯然，在香港人看來，如果國民黨當選，就不算是「守住臺灣」，只是他們不願意在選前公開講明這一點。

二、學生運動的再出發

就如同世界各地的學生運動一樣，臺灣學生的參與風潮都是呈現週期性的發展。在 2014 年的太陽花運動與 2015 年高中生反課綱運動之後，臺灣的學生運動呈現出衰退的樣態。在 2016 年政黨輪替之後，同婚爭議與勞基法二修吸引了青年與學生的參與，不過其關注度很快就消失。在 2018 年之後，大學生對於公共事務之關切開始回升，不同議題的參與開始出現了匯流。

2018 年初的勞基法二修引發學生與青年抗議，之後，有些大學學生會幹部認為有必要成立一個代表青年聲音的組織，而且不只是受限於依法得每年改選的學生自治組織。在 2018 年 6 月，這群學生成立了臺灣青年民主協會，積極倡議與鼓勵學生的政治參與。從 2016 年起，因為各種校園學生權益的爭議，各大學學生會共同提出了大學法改革之訴求，要求更多的學生參與。這群學生在 2019 年 4 月組成了臺灣學生聯合會，由各參與學校的學生會所組成。在臺學聯成立的同時，也有另一個青年抵制假新聞陣線出現，其原因在於一些學校的餐廳經常播放挺韓國瑜的中天電視臺，引發學生不滿。有些學生發起轉臺運動，才發現遙控器的主導權並不是在他們手裡，也因此發起一波抵制「中國因素」的運動。最後，2018 年的臺大校長管中閔的遴選與任命案引發了相當大的風波，臺大學生會多次要求提案調查，但是都被親國民黨的行政體系打壓，因此引發更大的學生不滿。

臺灣青年民主協會、臺灣學生聯合會、青年抵制假新聞陣線等團體有若干成員是重疊，但是大致上都是偏獨派的學生。這些學生組織的出現，意味著政黨輪替後學生運動的再出發。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臺灣青年民主協會與臺灣學生聯合會在 2019 年的暑假分別舉辦學生培力營隊，其中經常討論的議題就是正在進行中的香港反送中運動。因此，有些參與營隊的大學生與高中生，就在 9 月開學後在各自校

園發起連儂牆。^⑳

三、公民團體的再集結

臺灣的公民團體通常規模不大，平時有各自關切的議題，但是遇到共同的挑戰，通常會採取針對特定議題的合作。2014 年的太陽花運動經常被簡化成爲學生運動，但是來自於勞動、環境、性別、人權等倡議組織的合作，其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許恩恩、吳介民、李宗棠、施懿倫 2019）。在當時，公民團體以「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名義共同合作，在占領立法院結束後，該聯盟組織以「經濟民主連合」名義持續運作。

在 2018 年的九合一選舉與公投，國民黨大獲全勝，包括同婚與反核在內的進步陣營的主張也嚴重挫敗。參與經濟民主連合的各個公民團體認爲，臺灣的民主面臨了存續的危機，太陽花運動所爭取到的臺灣前途自決之成果受到挑戰。同時，民進黨內部也出現了另類的檢討意見，主張執政一定要保守，進步的訴求是票房毒藥。這些獨派的公民團體持不同意見，他們認爲，進步訴求是有票房的，所以需要從公民團體長期倡議的議題中找選票，在社運倡議與選票中找交集或是連結點（賴中強 2020, 16）。在 2019 年 3 月 18 日，臺灣公民陣線成立，其成員即是來自於先前經濟民主連合的運動者與學者，而且特意選在占領立法院的五週年成立，也是宣示承續太陽花運動未完成之志業。

臺灣公民陣線成立之初關心的議題是國民黨所提出的和平協議，因爲這樣的協議結果必然導致被併吞，違背臺灣人的前途自決。因此，公民團體是基於反統的共同訴求而集結起來，而且他們也意識到與香港人反送中之共同性。臺灣公民陣線的召集人指出，

「公民陣線非常在意臺灣所面臨的問題，香港人是面臨逃犯條例，而臺灣人則是承受中國因素的威脅。所以在 616 集會與 929 遊行中，拒絕一中和平協議成爲主要訴求之一，這是我們的要求，臺灣與香港都是共同面臨了中國的壓力。我們不只透過反送中運動表達這個訴求，也透過其他場合來提出來……我們一直追著國民黨候選人，要他們表態」。^㉑

註⑳ 作者訪談，臺灣青年民主協會理事，2020 年 2 月 20 日。

註㉑ 作者訪談，臺灣公民陣線召集人，2020 年 3 月 2 日。

換言之，從公民團體的角度來看，聲援香港人的反送中運動就是避免臺灣被併吞，也是反一中和平協議的延伸。

四、教會：信仰的跨界支持

在香港雨傘運動前後，民主運動與基督宗教的合流是明顯的趨勢。在 2013 年發起的「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運動，三位倡議者都是教徒，而且高度借用宗教的元素（例如在教堂舉行成立大會等）（Chan 2015）。這樣風潮也影響到臺灣的教會，尤其是本土色彩的臺語教會，例如下文要提到的臺北濟南長老教會與臺南的長老教會。在反送中運動之初，香港基督教徒很早就投身其中，許多教會連署反對逃犯條例，信徒在抗爭現場唱聖歌《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連續好幾個小時都不中斷。有些教會收容受傷、被追捕的抗爭者（邢福增 2019），這樣景象也感召了許多臺灣的信徒。

位於臺北的濟南長老教會很早與雨傘運動領袖戴耀庭、陳健民、朱耀明熟識，因此關注雨傘運動的後續司法審判與各種抗爭活動。在 2019 年「占中九子」案宣判之前，香港的基督教徒就在 4 月 1 日舉行一場「傘下同行、民主苦路」遊行。不久後，戴耀庭、陳健民被判入獄，濟南長老教會在耶穌受難日（4 月 19 日），也舉行了一場「守護臺灣、同行苦路」遊行。透過這些跨海聲援，濟南長老教會很早就關注到逃犯條例的議題，也意識到這將是接下來香港民主運動最大的挑戰。³⁰因此，從 6 月初反送中運動進入密集動員高潮之後，濟南長老教會就積極投入，舉行多次的禱告會、追悼會、演講與分享（「神學禮拜日」）、電影放映會等活動。此外，教會人士也投入人道物資收集與運送。也由於其非常便利的地點，濟南教會成爲一些逃難來臺香港抗爭者的首站，教會投入安置與協助香港手足的工作（Engelbrecht 2019）。

臺南的長老教會也是另一股參與反送中運動的力量，他們多次舉行祈禱活動。在 2015 年，臺南的教會人士就曾邀請黃之鋒到臺南神學院分享其信仰與公共事務的參與，對於香港議題向來相當關注。³¹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的教會因爲同婚議題產生相當明顯的分歧，濟南教會通常被認爲是傾向支持同婚，而臺南的長老教會則積極投入反同運動。在臺南的反送中運動，教會所發起的活動與挺同色彩明顯的公民團體（如臺南新芽）的活動涇渭分明，不會相互邀約。儘管有些差異，支持

註³⁰ 作者訪談，臺灣長老教會 JN 教會主任牧師，2020 年 4 月 10 日。

註³¹ 作者訪談，臺灣長老教會民族教會牧師，2020 年 5 月 7 日。

反送中卻是難能可貴的共識。

長老教會長期以來被認為具有濃厚的獨派色彩，但是教會主事者強調他們投身於反送中運動並不是出於政治意識型態，而是在於實踐基督教的人道關懷。從他們看來，幫助有需要的人即是聖經上所提到「善心的撒馬利亞人」，也是教徒的義務。

五、律師：太陽花運動律師團的延續

臺灣的律師並沒有發起本文所關注的抗爭性集會，但是由於 20 多位律師參與的「香港抗爭者支援工作臺灣義務律師團」，逃難來臺的香港抗爭者獲得了法律協助，得以向政府爭取入境、簽證、居留等權利（陳星穎 2019），也算是臺灣反送中運動之中非常重要的戰線。

臺灣的律師投身於社會運動有其歷史脈絡。在 2000 年政黨輪替之後，環境運動開始採取法律訴訟的策略，挑戰一些會造成生態危害的開發案（王金壽 2015）。在太陽花運動前夕，關廠勞工、大埔案、苗栗反風車等運動也吸引了一群年輕律師的參與。在占領立法院運動期間，約四百多位律師輪班進駐現場，因應隨時可能發生的狀態。在太陽花運動落幕之後，相關的法律程序仍在進行之中。一方面，運動者被檢察官控訴，主要有 318 占領立法院、323 占領行政院、411 包圍中正一分局三個案子；一方面，在行政院事件受到警察暴力攻擊的受害者也提出各種自訴案與要求國家賠償。無論是被告或自行提起告訴，318 義務律師團一直保持運作，也延續這一群具有運動理念的法律人之聯繫。^②在反送中運動正式登場之前，臺北律師公會就曾發表聲明，反對逃犯條例，因為該條例將臺灣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部分（臺北市律師公會 2019）。等到 2019 年夏天，香港反送中運動出現了逃難潮，提供法律協助的義務律師即是來自於這個團隊，其中許多參與者與臺灣人權促進會、司法扶助基金會密切合作關係。

陸、「有臺灣特色的反送中運動」：基於在地脈絡的境外聲援

發生在臺灣的反送中運動具有雙重的意義，一方面是海外港人的組織與集

註② 作者訪談，318 事件義務律師，臺灣，2020 年 3 月 13 日。

結，另一方面則是臺灣人對於香港運動的跨境聲援。先就前者而言，由於前面提到的地理與歷史的親近性，臺灣是香港運動非常重要的海外基地。也因為香港是中國政府向臺灣垂範所謂一國兩制的實驗場址，臺灣人對於香港人的苦難特別有感，引發共鳴，使得在臺港人的動員與宣傳工作容易進行。相對於此，在其他西方國家的香港人運動，則面臨艱困的挑戰，最主要的問題在於，主流社會為何需要關注香港？一位港裔加拿大運動者就指出：

「加拿大人一定會問我們，為何要關心香港？我們的說法是，我們在香港具體感受到中共的控制，這份經驗對於我們作為加拿大人也是重要。港版國安法第 38 條就是適用於全世界，這一點是最明顯的。你去向每一個加拿大人講，他們都說沒有道理，問題就是這正是中共在做的事情，他們就是要控制所有人，強迫大家按照他們的意思。這種事到處發生，不只在加拿大，也是澳洲、日本、臺灣、其他歐洲國家」。^③

同樣地，一位晚近才移到澳洲的香港人也分享也這樣的經驗：

「在我們的活動中，我會強調是以澳洲公民身分來發言，不只是香港人，澳洲重視多元文化，我們同時是澳洲人也是香港人。我們的遊說都強調澳洲的國家利益，這樣才會成功，只是講香港，就會出現這樣問題：澳洲為何要幫香港？所以我們的活動都強調，我們是澳洲香港人（Hongkong Australians）」。^④

值得注意的，在臺灣的反送中運動中，即使由香港人主導的行動，也沒有曾出現需要「正當化」其訴求的想法。在臺的港人主事者顯然將臺灣當作其主場的延伸，而不需要證明他們的訴求是符合當地社會的利益。用一個筆者親身觀察的實例來說明，在 2020 年 6 月 13 日，臺北自由廣場舉行一場反送中一週年的「抗爭未完，臺港同行」晚會，媒體報導吸引了七千人參與。臺上的香港主持人帶領群眾高喊，「黑警死全家」、「中共死全家」、「Fuck China」等口號。這些「粗口」在香港的抗爭現場是司空見慣的，但是放在臺灣的社會運動脈絡則顯然是不尋常的，

註③ 作者訪談，Alliance Canada Hong Kong 幹部，臺灣，2020 年 7 月 3 日。

註④ 作者訪談，Australia-Hong Kong Link 幹部，臺灣，2020 年 6 月 17 日。

尤其讓一些親子同行的臺灣參與者感到難堪與不安。

在西方國家的香港人需要強調他們是主流社會的一環，而不只是依靠當地施恩的難民。在武漢肺炎期間，西方國家的香港人組織往往採取了捐贈口罩或醫療物資的行動，以協助融入於當地社會。一位流亡英國的香港運動者就指出：

「我們香港人沒有貢獻英國社會，也會影響英國人的觀感。我們要英國政府 Stand with HK，但遇到肺炎，我們可以說我們也是 Stand with UK。我們去醫院捐款，我們去宣傳香港人的正面形象，等於是為後來 BNO（適用於香港人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運動鋪路」。^⑤

為何在臺灣的香港人沒有想到要「貢獻臺灣社會」，「宣傳香港人的正面形象」？很顯然，他們是將臺灣當成香港本地戰線的延伸，而不是真正的「國際線」。^⑥這也解釋了為何有些香港人在臺灣的反送中活動中，覺得自己是「局外人」，原因正在於他們很可能是忽略了臺灣的在地脈絡，而素樸地認為臺灣人看到的逃犯條例之威脅，應該就是與香港人的想法一致。

在此，可以進一步探討在地脈絡如何形塑了臺灣反送中運動的輪廓。前面提到，積極參與其中政黨、學生、公民團體、教會、律師，大部分都是具有濃厚的獨派色彩。這些行動者願意聲援香港人抗爭，並且從中推動臺灣的「抗中」輿論氣氛，這是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問題在於，他們如何能成功地主導了臺灣反送中運動的調性？這涉及了 2016 年政黨輪替帶來了兩項變遷，首先，國民黨與統派陣營走上民粹化與「紅統」化，在香港議題上喪失了發言權。其次，獨派社運人士沉寂一段時間之後，終於在香港議題找到施力點。

在 2014 年的雨傘運動期間，馬英九總統曾利用雙十演講的場合，公開支持香港人民民主運動，他借用鄧小平的話，期待北京當局能夠「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在執政時期，國民黨仍願意得罪共產黨，表明支持香港民主化。但是等到其下野之後，對於香港的言論尺度反而更退縮。在下臺之後，馬英九從來沒有對於逃犯條例爭議表態，他無視反送中運動中喪失性命的香港人，反而在要求臺灣政府接

註⑤ 作者訪談，Hongkongers in Britain 幹部，臺灣，2020 年 7 月 16 日。

註⑥ 在此，作者並非指責香港人來臺灣沒有「貢獻」，只想要「坐享其成」。事實上，許多移民來臺灣的香港人都會提到，他們不想要成為他們在香港看到的「新移民」，只占用好處，也不認同新移居地。就作者了解，有些香港人加入獨派政黨、舉辦農村的導覽，讓香港人知道臺北以外的臺灣、有些香港人商店也舉辦「感謝臺灣」的活動等。

受陳同佳的投案，這等於是與香港政府立場完全一致。韓國瑜是國民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在此之前，他曾公開進入香港與澳門的中聯辦，也對於香港人的抗爭不願表態，多次閃爍其詞。一些統派名嘴更呼應香港建制派的言論，毫無保留支持逃犯條例（中時新聞網 2019）。

在 2016 年政黨輪替之後，街頭抗議成爲保守派的戰場，無論其訴求是反對年金改革、反對同性婚姻、反對非核家園。獨派與社運人士在進入體制之後，聲量反而變小。在 2018 年地方選舉與公投，保守派與國民黨大勝反而激發了其動員的意願。隨著香港逃犯條例爭議在 2019 年爆發與持續延燒，他們獲得絕佳的機會，得以宣揚臺灣「香港化」的危機。也因此，臺灣人所發起的反送中運動並不是完全緊貼香港人抗爭的脈動，而是反映了臺灣人的自身焦慮。

進一步而言，臺灣人對於自身的認同與擔憂也形塑了其對於境外運動的關注。就以六四天安門運動的聲援而言，在第三年之後（1991），就沒有大規模的戶外悼念活動。一直到了 2011 年，臺北市自由廣場（之前的中正紀念堂廣場）的悼念儀式才重新登場。在先前，臺灣的天安門運動者主張臺灣與中國大陸「血脈相連」，北京民運的失敗是「歷史的傷口」。然而，隨著中國全球政經實力的躍升，似乎證明了邁向強國之路不需要民主，這使得臺灣原先的「民主統派」喪失了發言權。在 2011 年之後，臺灣六四紀念晚會由學生運動分子所承接，他們強調「中國因素」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臺灣則是與香港，或是其他東亞地區國家一樣，成爲抵禦極權輸出的防線（Ho 2020b）。

同樣的解釋也可以適用於臺灣對於圖博人（西藏人）運動的支持，³⁷在 2008 年，圖博人採取自焚抗議，反對中國政府的壓迫，臺灣在同年成立了臺灣圖博之友會；在隔年，一群學生運動者也組織了臺灣自由圖博學會。也不令人意外地，這兩個聲援圖博抗暴的團體都是由獨派運動者所主導，而統派與國民黨則是不願意明顯表示意見。

換言之，晚近以來的臺灣人聲援中國民運、香港反送中、圖博抗暴等境外的運動，都是有高度的相似性。這些聲援活動往往是由公民社會行動者所主導，而且都涉及了比臺灣人處境更艱困的群體。在臺灣人積極投入之際，他們也帶入了切身相關的議題（如抗中、反統等），也因此使其運動獲得更廣大的支持。理所當然，也由於臺灣仍是奉行中華民國憲法，大陸人、香港人、圖博人都不是法律上定義的外國人，也因此，臺灣運動者可以名正言順地呼應其抗爭，並且要求政府介入，無論

註³⁷ 關於臺灣聲援圖博人運動的參考個案，作者感謝審查者的提醒。

執政者是那一個黨派的。

最後，與在地脈絡相關問題即是關於臺灣政府如何回應香港急劇的變局。臺灣政府從一開始就表明拒絕依據逃犯條例草案引渡陳同佳，這項決定是基於國家尊嚴，就算是國民黨執政，也不可能默認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之規定。然而，誠如前面提到的，民進黨爲了 2020 年總統與立法院大選，積極宣傳香港危機，提出「臺灣離香港不遠，一張選票的距離」之說法，也被認爲是利用香港議題來獲取選票之操作。從 2019 年夏天，隨著送中運動者紛紛逃難來臺，臺灣的公民團體就提議應儘速制定難民法，以收容這些被面臨人權迫害的香港人。然而，基於種種考慮，臺灣政府不願意變更現行法律架構，只以個案處理方式來因應香港逃難風潮。在 2020 年七月，隨著港版國安法上路，臺灣政府所成立的「服務交流辦公室」依然被認爲只是虛應故事，不願意真正介入。一位參與救援香港手足的臺灣人就指出：

「每次提到難民法，就有綠營網軍來出征。如果民進黨政府真的是因爲擔心共謀混進來，他們就應公開講，不以講一套，做一套，政府不可以封閉管道。泰國給了很多中國人難民簽證，但是大家都知道，臺灣不可以只專案處理……民進黨從去年選舉開始，就是在吃『人血饅頭』（按：利用別人的苦難，來獲取個人利益）」。³⁸

這樣不滿民進黨政府的情緒，在某些移居臺灣的香港人與協助香港逃難的臺灣人之間持續延燒。在 9 月 12 日，更爆發了「鐘聖雄事件」。鐘聖雄是一位媒體記者，在 2019 年就有反送中運動的物資募集，隨著香港流亡潮出現，他也參與救援的工作。鐘聖雄公開在臉書發文，批評臺灣政府口惠不實，呼籲香港人不要再來臺灣。他更宣稱自己有協助先前搭船到東沙島的五位香港抗爭者。鐘聖雄講出許多人認爲不應公開講的「祕密」，到底是在幫香港人，抑或是害香港人，也見人見智。不過，這個事件至少證明了臺灣人參與的反送中運動，無論在國內聲援、抑或是跨境的物資與人員運送，是來自於民間的自發行爲，而不是政府的介入。

註³⁸ 作者訪談，臺灣獨立媒體負責人，2020 年 9 月 9 日。

柒、結論

從上述關於政黨、學生、公民團體、教會與律師之分析，可以發現臺灣不同領域的行動者之所以參與反送中運動，分別有相異的發展脈絡與動機，然而他們都發現香港人的運動與其核心關懷密切相關。其中，政黨的行動甚至呈現了相互競爭、搶奪議題發言權的情況，原因正是在於選舉的壓力迫使各政黨爭取選民的支持。但這是否意味著，政黨與政治人物只是工具性操作香港議題，並非出於價值與認同的關懷？筆者認為，更精準的檢驗標準是政黨與政治人物的選後行為，他們是否仍願意持續支持香港人爭自由的行動。

更重要的是，上述的行動者其實都參與了 2014 年的占領立法院運動，所以可以算是一種「太陽花聯盟」。只是在 2016 年政黨輪替之後，這個聯盟出現內部分歧與對立，有些成員轉為消極。民進黨上臺之後，採取較為務實的執政策略，使得過往社會運動盟友感到失望。兩次修改勞基法引發青年學生的抗議，同婚議題的延燒也導致本土教會的分裂。在 2018 年公投，進步派的公民團體與學生，與保守派的教會人士相互對抗，這兩個對立的陣營都不滿民進黨政府的處理方式。因此，就某個意義而言，香港人的處境加劇了不同公民社會的行動者之「亡國感」，激發出支持或是參與反送中運動的動力。

本文分析 95 件抗爭性集會案件，主要的發現如下：

一、發生在臺灣的反送中運動並不是所謂的「境外勢力」，而是由不同公民社會行動者所推動，也呈現空間廣泛分布的特性，不能簡化成爲海外香港人的「國際線」，因爲大部分活動是由臺灣人所發起的。

二、基於缺乏事先存在的組織，香港參與者是在運動過程中才建立彼此的聯繫。也因爲其身分限制與對於法律之不熟悉，香港人需要臺灣人的協助，然而兩個群體有各自的原先預設，有時會出現期待上的落差。

三、學生與公民團體是推動臺灣反送中運動的主力，民進黨與獨派小黨也扮演了一定角色。與香港的情況明顯不同，無組織的匿名行動不是常見的現象。

四、儘管其出發點不同，政黨、學生、公民團體、教會、律師分別參與這場撐香港的運動，而這樣的組合正好是 2014 年太陽花運動所凝聚的廣泛社會力，這或多或少解釋了反送中運動在臺灣所受到的廣泛支持。

本文指出，臺灣出現了密集動員而廣泛浮現的反送中運動，是香港人抗爭最重要的海外後勤基地，臺灣人支持反送中運動也跨越藍綠。臺灣人將其特殊的關切

帶入了這場反送中運動中，也因此其不再只是香港人的抗爭。在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各地的海外香港人也參與了反送中運動的國際線，積極投入遊說與物資募集的工作，但是一般而言，他們通常不會獲得在地公民社會的熱烈支持，而侷限於移民社群。值得注意的，臺灣民間的聲援活動是自發與廣泛的，積極參與其中的成員往往認為臺灣政府的介入是不足，也因此，制定難民法來保障逃難來臺灣的香港抗爭者，成為許多倡議組織的要求。這種官民之間的認知落差，也顯示發生在臺灣的反送中運動背後並沒有政府介入。

在此，仍有一個需要解答的問題：到底臺灣人是如何看待面臨政治壓迫的香港人？他們是我們的「同胞」，因此，臺灣人可以完全體會香港人的苦難與掙扎，他們的痛就是我們的痛？這個問題也十分類似這樣的提問：為什麼香港人始終忘不了六四天安門事件，因此三十年來每年都有盛大的追悼紀念活動（陳韜文、李立峰 2010）？在香港本土意識與港獨主張出現之前，這個問題的解答很簡單，因為香港人認同自身是中國人，天安門的失敗也就是香港人爭取民主的失敗。然而，基於過往歷史分隔，一般臺灣人可能很難產生如香港人般緊密連結的情感連帶，或許臺灣人的支持與認同只是策略性的，因為香港人幫臺灣人擋住了中國極權輸出的第一道防線。

隨著中國立法會機構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通過香港版國家安全法，香港人爭取自由的運動已經進入更加艱困的階段，臺灣政府也隨之公布人道救援的措施。到底臺灣人民如何看待香港人的苦難，臺灣人是否有可能產生強烈的情感連結，願意接納更多的香港流亡者；抑或是採取工具性的態度，反對更深度的介入？這將是非常值得觀察的問題。

* * *

（收件：109 年 7 月 11 日，接受：110 年 1 月 26 日）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in Taiwan: An Analysis of Contentious Gatherings

Ming-sho Ho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in Taiwan by looking at contentious gatherings. Hongkongers' opposition to extradition against China's legal authorities found widespread support in Taiwan and gave rise to an intensified wave of mobilization, which was quite unusual since it was not a domestic issue after all. Taiwan's campaign was promoted by different civil-society actors and evenly spread geographically. Most of the initiators were Taiwanese, and due to their status limitation, Hongkongers' actions typically needed Taiwanese's help. While students and advocacy groups played the leading role, the involvement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and other pro-independence parties was also considerable. Unlike what happened in Hong Kong, protest actions that were not pre-organized and anonymous were rare. Despite their different motivations, the particip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students, advocacy groups, churches, and lawyers represented a resurgence of those social forces that undergirded the 2014 Sunflower Movement. Finally, what happened in Taiwan cannot be easily subsumed under the idea of Hongkongers' "international front" because what happened in Taiwan involved widespread and spontaneous participation and involvement of pro-independence. In addition, Hongkonger activists also see Taiwan as a direct extension of their home front.

Keywords: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Taiwan, Hong Kong, Contentious Events.

參考文獻

- 中央通訊社，2019a，〈立院朝野反送中共同聲明，挺港人民民主自由訴求〉，<https://reurl.cc/d0ZqKg>，查閱時間：2020/05/20。Central News Agency. 2019a. “Liyuan chaoye fansongzhong gongtong shengming, ting gangren minzhu ziyou suqiu” [The Joint Statement of Ruling Party and Opposition Lawmakers: We Support Hongkongers’ Demand on Democracy and Liberty]. (Accessed on May 20, 2020).
- 中央通訊社，2019b，〈香港縮時，臺北街頭行動劇演出反送中抗爭〉，<https://reurl.cc/Y1zDO4>，查閱時間：2020/05/25。Central News Agency. 2019b. “Xianggang suoshi, taibei jietou hangdongju yanchu fansongzhong kangzheng” [Hong Kong Encapsulated: Dramatizing of the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on Taipei Streets]. (Accessed on May 25, 2020).
- 中央通訊社，2019c，〈港生赴總統府陳情，陳菊允諾保護在臺港人安全〉，<https://reurl.cc/MvEMrp>，查閱時間：2020/05/20。Central News Agency. 2019c. “Gangsheng fu zongtongfu chenqing, chenju yunnuo baohu zaitai gangren anquan” [Hong Kong Students’ Petitioning at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Chen Chu Promised to Protect Hongkongers’ Safety in Taiwan]. (Accessed on May 20, 2020).
- 中時新聞網，2019，〈香港「反送中」真相？黃智賢提6問〉，<https://reurl.cc/14kjep>，查閱時間：2020/10/18。China Times. 2020. “Xianggang fansongzhong zhenxiang? huang zhixian ti liu wen” [The Truth of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Huang Zhixian Raised Six Questions]. (Accessed on October 18, 2020).
- 王金壽，2015，〈臺灣環境運動的法律動員：從三件環境相關判決談起〉，《臺灣政治學刊》，18（1）：1-72。Wang, Chin-shou. 2015. “Taiwan huanjing yundong de falu dongyuan: cong sanjian huanjing xiangguan panjue tanqi” [The Legal Mobilization of Taiwanese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Talking from Three Environmental-Related Judgments]. *The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8 (1): 1-72.
- 自由時報，2019a，〈專程來臺致歉，方仲賢：不可能批評支持香港的民進黨〉，<https://reurl.cc/5lnXXn>，查閱時間：2020/05/26。Liberty Time Net. 2019a. “Zhuancheng laitai zhiqian, fangzhongxian: bukeneng piping zhichi xianggang de minjindang” [Keith Fong Came to Taiwan for Apology: I Did Not Mean to Criticize Pro-Hong Kong DPP]. (Accessed on May 26, 2020).
- 自由時報，2019b，〈新竹市民進黨和時代力量，同步發起聲援香港反送中〉，<https://reurl.cc/kdA9Xq>，查閱時間：2020/05/26。Liberty Time Net. 2019b. “Xinzhushi

- minjindang he shidai liliang, tongbu faqi shengyuan xianggang fansongzhong” [DPP and NPP Staged Solidarity Rallies to Support Hong Kong’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Simultaneously in Hsinchu]. (Accessed on May 26, 2020).
- 吳介民、蔡宏政、鄭祖邦，2017，《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臺北：左岸。Wu, Jieh-min, Chien-chun Huang, and Tsu-bang Cheng. 2017. “Diaodengli de jumang: zhongguo yinsu zuoyongli yu fanzuoyongli” [The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 Action and Reaction of China Factor]. Taipei: RiveGauche.
- 邢福增，2019，〈反修例運動中的香港基督宗教〉，<https://reurl.cc/exK3jm>，查閱時間：2020/01/16。Ying, Fuk-tsang. 2019. “Fanxiuli yundong zhong de xianggang jidu zongjiao” [Hong Kong’s Christianity in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Accessed on January 16, 2020).
- 林宗弘、陳志柔，2020，〈817震撼：綠營大勝裡的香港因素與社會意向〉，<https://reurl.cc/oLE1ll>，查閱時間：2020/05/19。Lin, Thung-Hong, and Chih-Jou Jay Chen. 2020. “817 zhenhan: luying dasheng li de xianggang yinsu yu shehui yixiang” [The Shock of 8.17 Million Vote: The Hong Kong Factor and Social Images Behind the Victory of the DPP]. (Accessed on May 19, 2020).
- 風傳媒，2019，〈民進黨發布廣告影片，港人現身說法勿信一國兩制〉，<https://reurl.cc/E7dYy0>，查閱時間：2020/05/26。The Storm Media. 2019. “Minjindang fabu guanggao yingpian, gangren xianshen shuofa wuxin yiguo liangzhi” [The DPP Releases a Commercial Footage, with Hongkongers’ Testimonial Not to Trust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ccessed on May 26, 2020).
- 風傳媒，2020，〈歷史新高！中研院最新民調：7成臺灣人不認中國政府是朋友〉，<https://reurl.cc/j70mnM>，查閱時間：2020/07/13。The Storm Media. 2020. “Lishi xingao! zhongyanyuan zuixin mindiao: 7cheng taiwanren buren zhongguo zhengfu shi pengyou” [The Historical High in the Poll Survey by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Seventy Percent Taiwanese Do Not Thin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a Friend]. (Accessed on July 13, 2020).
- 許恩恩、吳介民、李宗棠、施懿倫，2019，〈「我們NGO」：太陽花運動中的網絡關係與社運團結〉，《臺灣社會學》，38：1-61。Hsu, En-en, Jieh-min Wu, Tsung-tang Lee, and I-lun Shih. 2019. “‘Women NGO’: taiyanghua yundong zhong de wangluo guanxi yu sheyun tuanjie” [The Story of “We-NGO”: Explaining the Networks and Solidarity of the Sunflower Occupy Movement]. *Taiwanese Sociology*, 38: 1-61.

- 陳星穎，2019，〈爲香港而戰，卻回不了香港：反送中運動下無根的「旅行者」〉，
<https://reurl.cc/arKnQX>，查閱時間：2020/5/28。Chen, Hsing-ying. 2019. "Wei xianggang erzhan, que huibule xianggang: fansongzhong yundong xia wugen de 'luhangzhe'" [Those Who Fight for Hong Kong and Are Not Able to Return: The Rootless "Travelers" of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Accessed on May 28, 2020).
- 陳韜文、李立峰，2010，〈香港不能忘記六四之謎：傳媒、社會組織、民族國家和集體記憶〉，《新聞學研究》，103：215-259。Chan, Joseph M., and Francis L. F. Lee. 2010. "Xianggang buneng wangji liusi zhimi: chuanmei, shehui zuzhi, minzu guojia he jiti jiyi" [Why Can't Hong Kong Forget the June 4th Incident? Media, Social Organization, Nation-State and Collective Memory].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03: 215-259.
- 黃之鋒，2019，〈「香港人權民主法案」通過感言〉，<https://reurl.cc/xZqW05>，查閱時間：2020/05/20。Wong, Joshua. 2019. "'Xianggang renquan minzhu faan' tongguo ganyan" [Speech on the Passage of US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Accessed on May 20, 2020).
- 端傳媒，2020，〈大檢控〉，<https://reurl.cc/2gQk14>，查閱時間：2020/10/16。Theinitium. 2020. "Da jiankong" [A Great Prosecution]. (Accessed on October 16, 2020).
- 臺北市律師公會，2019，〈臺北市律師公會針對香港修訂引渡法之聲明〉，<https://reurl.cc/qdeaXn>，查閱時間：2020/07/03。Taipei Bar Association. 2019. "Taibeishi lushi gonghui zhendui xianggang xiuding yindufa zhi shengming" [Taipei Bar Association's Statement regarding Hong Kong's Revision on Extradition]. (Accessed on July 3, 2020).
- 蔡英文，2019，〈《大聲說話》：2020小英總統競選CF〉，<https://reurl.cc/exYQGb>，查閱時間：2020/10/16。Tsai, Ing-wen. 2019. "'Dasheng shuohua': 2020 xiaoying zongtong jingxuan CF" [Speaking Out Loudly: Tsai Ing-wen's Commercial Film for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Accessed on October 16, 2020).
- 獨立媒體，2019，〈臺灣時代力量反對借修例將臺灣納中國一部分〉，<https://reurl.cc/qdea5p>。Inmedia Net. 2019. "Taiwan shidai liliang fandui jie xiuli jiang taiwan na zhongguo yi bufen" [Taiwan's NPP Opposes the Extradition Bill Revision That Assumes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Accessed on May 25, 2020).
- 賴中強，2020，〈爲什麼公民不入政？〉，賴中強編，《臺灣公民陣線2020政綱》：15-20，臺北：經濟民主連合。Lai, Chung-chiang. 2020. "Weishime gongmin bu ruzheng?" [Why Don't Citizens Join Politics]. In Chung-chiang Lai, ed., "*Taiwan gongmin zhenxian 2020 zhenggang*" [The 2020 Policy Platforms of Taiwan Citizens' Front], pp. 15-20.

Taipei: Economic Democracy Union.

- 聯合新聞網，2019a，〈我表態給予人道救援，國臺辦：停止插手香港〉，<https://reurl.cc/j70mzD>，查閱時間：2020/05/20。United Daily News. 2019a. “Wo biaotai geiyu rendao jiuyuan, guotaiban: tingzhi chashou xianggang” [Taiwan’s Willingness to Offer Humanitarian Aids. China’s Taiwan Affairs Office: Stop Interfering into Hong Kong]. (Accessed on May 20, 2020).
- 聯合新聞網，2019b，〈李孟居被捕，中共官媒：反中亂港者抓〉，<https://reurl.cc/vDNKvk>，查閱時間：2020/05/20。United Daily News. 2019b. “Limengju beibu, zhonggong guanmei: fanzhong luangangzhe zhua” [CCP’s Official Media on Li Mengju’s Case, Those Who Oppose China and Mess with Hong Kong Will be Arrested]. (Accessed on May 20, 2020).
- 聯合新聞網，2019c，〈香港反送中幕後推手，董建華點名臺灣美國〉，<https://reurl.cc/O1WROD>，查閱時間：2020/05/20。United Daily News. 2019c. “Xianggang fansongzhong muhou tuishou, dongjianhua dianming taiwan meigu” [Tung Chee-hwa Claims Taiwan and US to Be the Hand behind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Protest]. (Accessed on May 20, 2020).
- 聯合新聞網，2020，〈國民黨敗選檢討報告4：兩岸論述未因應變局、不受青年選民青睞〉，<https://reurl.cc/E7dbNg>，查閱時間：2020/05/19。United Daily News. 2020. “Guomintang baixuan jiantao baogao 4: liangan lunshu weiyinying bianju, bushou qingnian xuanmin qinglai” [The KMT’s Reflection Report on the Electoral Defeat: The Cross-Strait Discourse Failed to Meet the Circumstances and Unpopular among Young Voters]. (Accessed on May 19, 2020).
- Anderson, Benedict. 1998. *The Specter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London: Verso.
- Bennett, W. Lance, and Alexandra Segerbert. 2013.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stells, Manuel. 2012. *Network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Oxford: Polity Press.
- Chan, Debby Sze Wan, and Ngai Pun. 2020. “Economic Power of the Politically Powerless in the 2019 Hong Kong Pro-Democracy Movement.” *Critical Asian Studies*, 52 (1): 33-43.
- Chan, Nathan Kar Ming, Lev Nachman, and Chit Wai John Mok. 2020. “A Red Flag for

- Participatio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Mainlandization on Political Behavior in Hong Kong.” <https://doi.org/10.1177/1065912920957413> (September 13, 2020).
- Chan, Shun-hing. 2015. “The Protestant Community and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 Hong Kong.”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6 (3): 380-395.
- Cheng, Stealing. 2020. “Pikachu’s Tears: Children’s Perspectives on Violence in Hong Kong.” *Feminist Studies*, 46 (1): 216-225.
- Choi, Susanne Y. P. 2020. “When Protests and Daily Life Converge: The Spaces and People of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40 (2): 277-282.
- della Porta, Donatella, Hanspeter Kriesi, and David Rucht. eds.. 1999. *Social Movement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London: Macmillan.
- Engelbrecht, Cora. 2019. “We Are Fleeing the Law: Hong Kong Protesters Escape to Taiwan.” <https://reurl.cc/20RZ9X> (May 28, 2020).
- Flesher Fominaya, Christina. 2014. *Social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Ho, Lawrence. 2020. “Rethinking Police Legitimacy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Paramilitary Policing in Protest Management.” *Policing*, 14 (4):1015-1033.
- Ho, Ming-sho. 2019a. “Taiwan’s Road to Marriage Equality: Politics of Legalizing Same-sex Marriage.” *China Quarterly*, 238: 482-503.
- Ho, Ming-sho. 2019b. *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Ho, Ming-sho. 2020a. “How Protesters Evolve: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Learned the Lesson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5 (SI): 711-728.
- Ho, Ming-sho. 2020b. “The Changing Memory of Tiananmen Incident in Taiwan: From Patriotism to Universal Values (1989~2019).” <https://doi.org/10.1177/0920203X20971454> (November 24, 2020).
- Keck, Margaret E., and Kathryn Sikkink. 1998.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u, Agnes S. 2020. “New Forms of Youth Activism: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in the Local-National-Global Nexus.” *Space and Polity*, 24(1): 111-117.
- Lee, Francis L. F. 2019. “Solidarity in the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in Hong Kong.” *Critical Asian Studies*, 52 (1): 18-32.

- Lee, Francis L. F., Gary K. Y. Tang, Samson Yuen, and Edmund W. Cheng. 2020. "Five Demands and (Not Quite) Beyond: Claim Making and Ideology in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53 (4): 22-40.
- Lee, Francis L. F., Samson Yuen, Gary K. Y. Tang, and Edmund W. Cheng. 2019. "Hong Kong's Summer of Uprising: From Anti-Extradition to Anti-Authoritarian Protests." *China Review*, 19 (4): 1-32.
- Lui, Tai-Lok. 2020. "The Unfinished Chapter of Hong Kong's Long Political Transition."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40 (2): 270-276.
- Mathews, Gordon. 2020. "The Hong Kong Protests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National Identity and What it Means."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40 (2): 264-269.
- The Economist. 2020. "Autocrats See Opportunity in Disaster." <https://reurl.cc/3DVbWL> (May 19, 2020).
- Tilly, Charles. 1981. *As Sociology Meets Hist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Tilly, Charles. 1997. "Parliamentarization of Popular Contention in Great Britain, 1758~1834." *Theory and Society*, 26: 245-273.
- Tilly, Charles. 2004. *Social Movements, 1786~2004*. Boulder, CO: Paradigm.
- Ting, Tin-yuet. 2020. "From 'Be Water' to 'Be Fire': Nascent Smart Mob and Networked Protests in Hong Kong."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9 (3): 362-368.
- Wang, Peng, Paul Joosse, and Lok Lee Cho. 2020. "The Evolution of Protest Policing in a Hybrid Regim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60 (6): 1523-1546.
- Wei, Shuge. 2016. "Recovery from 'Betrayal': Local Anti-Nuclear Movements and Party Politics in Taiwan." *Asia-Pacific Journal*, 14 (3): 1-21.